

编者按

如果把名校看成一块就业的跳板,多数人会选择向上,李志春却是主动向下的那一个。在他的求学和职业道路上,充满了对教育和学术生态中那些既定规则、秩序、结构的拆解和反叛,他是一名解构主义的践行者。在我国第40个教师节来临之际,让我们走近这样一位主动“向下”的老师,体验一下他的“快乐人生”。

最近,社交媒体上时常出现对博士学历泡沫和被“非升即走”困住的“青椒”的“吐槽”。每每刷到这些内容,李志春都会庆幸当初的选择。2016年,从复旦大学哲学系博士毕业的李志春,主动选择到一所民办二本高校——同济大学浙江学院,成为该校社会科学部的一名讲师。如今的他,上课和同学倾诉,下课休闲娱乐,吃住在“公园”(学校),把对生活的体悟做成了研究,把研究过成了生活。最让他意外的是,自己第一年站上讲台就成了学校的“明星”讲师。授课不到一个月,学生就自发搜集了他的各种资料,并将其在朋友圈刷屏;临近考试,总有学生拿他的照片做各类头像;疫情初期上网课时,学生们在直播间刷爆各种礼物,吓得他只好放弃直播平台;毕业论文里,有学生把对他的感谢排在了导师前面……

开学第一课

9月2日下午1点半,同济大学浙江学院H楼103阶梯教室,机械电子工程系专升本的大一新生坐得满满当当。这是他们的开学第一课——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李志春备课不死板,只是制定一个大致框架。针对这节课,他想谈一谈和学习有关的事情,然后聊一聊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至于具体讲什么,主要靠“想到哪儿,说到哪儿”。为了方便学生了解,李志春先做了一个自我介绍。当听到李志春的学习经历都是在复旦大学时,现场出现一阵小小的骚动。

有人惊呼,有人鼓掌,还有人嘀咕这是“大材小用”。8年前,李志春在这样一所学校、这样一个课堂的出现可以算是异类。直到今天,在这届学生心里,依旧是“名校毕业生就该进好学校”。这种“阶层”意识根深蒂固,深刻影响着学生们的思维方式以及行动力。

李志春告诉大家,这些年,他看到这所学校的学生和复旦学生有一个非常大的不同:“在这里,很多人遇到困难时的心态是——世上无难事,只要肯放弃,往往事情还没做,就觉得自己不行;但同样的困难摆到复旦学生面前时,他们可能不会想自行不行,只会花很长时间去做。”李志春说,二本的学生总是误解自己能力不行,却不知在绝对的困难面前,既有成绩上的某些差距可以忽略不计。以美国研究生入学考试(GRE)为例,李志春的英语不错,上海高考成绩为140多分,进大学时的词汇量达到5000多个,但他第一次做题时却几乎遭到碾压,因为这项考试的词汇要求是2万个。这时,如果你四级没过,哪怕词汇量仅有2500个,在GRE面前,我们的差距完全可以被抹平。你不会的,我也不会。”他说。按照考试要求,学生需要在11分钟内做完一篇阅读理解的8道选择题,李志春第一次梳理完



■本报记者胡珺珺

受访者供图

活成别人羡慕的样子 复旦博士到民办高校当老师

全部内容花了3个小时。在接下来的1周,他每天只做1篇,1个星期后,他花费的时间缩短到2小时50分钟。如此坚持了8个月,他终于可以在11分钟内完成了。“当你只看结果时,会觉得这个学生很厉害,但他其实整整坚持了8个月。有这个时间,只要是智力正常的学生都可以完成。奇怪的是,这所学校的很多学生从一开始在心理上就输了。”然而,人在这样的社会中又该如何生活?李志春告诉大家,青年马克思是一个特别强调自由意志的人,从自由出发,从生存出发,从实践出发,去完成他一生的哲学革命。这也是今天的青年正在切身经历和想要解决的问题。这堂课的最后,李志春告诉学生,在大学生校园里,没有谁比谁更优秀。已经大三的李一鸣是李志春的“迷弟”。在他看来,“春哥的课总是和生活实际紧密相连,并且顺应着我们在课堂上的感受而不断向外延伸”。李志春说,自己上课从来不刻意设计,也没有预先的教案。他把上课看成是艺术化的过程,除了一些绕不开和必须要说的基本知识点,其余的就是自然而然、随性展开。“这堂课究竟会走向何方,取决于当时的一种情境涌现,即跟学生的互动。老师只是情境中的一环。至于学生能学到什么,只有回溯时才能归纳总结,而不是教师从一开始就能演绎出来的。”他说。

现实化,对象化表现为对象的丧失和被对象奴役,占有表现为异化、外化。”李志春鼓励学生们读马克思的原著。“你会发现,马克思在替当代的打工人说话,替那些被贴上各种标签的异化人说话。”然而,人在这样的社会中又该如何生活?李志春告诉大家,青年马克思是一个特别强调自由意志的人,从自由出发,从生存出发,从实践出发,去完成他一生的哲学革命。这也是今天的青年正在切身经历和想要解决的问题。这堂课的最后,李志春告诉学生,在大学生校园里,没有谁比谁更优秀。已经大三的李一鸣是李志春的“迷弟”。在他看来,“春哥的课总是和生活实际紧密相连,并且顺应着我们在课堂上的感受而不断向外延伸”。李志春说,自己上课从来不刻意设计,也没有预先的教案。他把上课看成是艺术化的过程,除了一些绕不开和必须要说的基本知识点,其余的就是自然而然、随性展开。“这堂课究竟会走向何方,取决于当时的一种情境涌现,即跟学生的互动。老师只是情境中的一环。至于学生能学到什么,只有回溯时才能归纳总结,而不是教师从一开始就能演绎出来的。”他说。

善学“慧”玩

讲课时的李志春之所以自由、随性,是因为他

的学生时代就是这样度过的。他有放养式育儿的双亲,很少对他提要求,而是告诉他开心就好。有一次,父亲参加学校家长会,散会后竟溜走赶赴邻居的麻将之约去了。父母的极度“松弛”,让李志春从小在学习上就没啥目标,对好学校也没有概念。事实上,他的小学、初中是在一片棚户区的学校度过的,那里是打架、闹事学生的“聚集地”,但他从不认为那些孩子本质上就是“坏小孩”。那时候,正在学骑自行车的李志春害怕上马路,他们便很讲义气地围在他的外圈,对他说:“别害怕,车来了先撞我们,撞不到你的。”当时的李志春不知道“善良”和“高分”之间,到底哪个才算“好孩子”,他只知道,跟这些孩子一起玩要很快乐。高中时,李志春幸运地进入一所“玩学合一”的学校,它是上海最早推进高中育人方式改革的学校。“我们学校是全上海唯一一所下午3点05分放学的高中,而且从来没有晚自习,一周双休。我们会在午休时间到学校对面的公园弹吉他、聊音乐,放学后组队去书吧看书、写作业、聊哲学。我们还在上海高中联盟的BBS里‘灌水’艺术板块、文学板块、哲学板块、音乐板块……”正是从那时起,他知道了学习就是生活,生活就是学习。尽管他依然没有具体的目标,但他清楚地知道自己喜欢什么。他喜欢语文,喜欢音乐,喜欢一切生活的文本。学校十分鼓励学生自学,可以按照自己想学习的内容制订计划,遇到问题随时可以得到老师的帮助。“所谓学习目标,从来不是考上哪所大学,而是如何把这门科学学好,分析不足,改进方法,努力练习。如此,在得到结果后,能去哪所学校就去哪所学校。”李志春认为,这同样是一种自然而然。进入中文系后,李志春进一步放飞自我。常常上午看小说,下午在咖啡馆自习,晚上去酒店兼职弹钢琴,周末和社团的朋友唱歌、排练音乐剧。他还曾有过一星期逃8节大课去旅行的“壮举”。他说:“打破规则是一件很爽的事情,只要能掌握知识,管我是怎么学的。”李志春说,学习,学习的意义就是对一个人起到历史积淀的作用,并埋下一个机缘,如此而已。至于它最终会发挥多大作用,则由每个人未来生活的境遇决定。因此,生活才是最最重要的。李志春曾在一篇文章中写过这样一段话——

苏轼比较了两类画竹的方法,一类是“叶叶而累之”的“定取”,这种面面俱到如涂鸦般写实是一种知识性观看;另一类是“成竹于胸”,即“以神存之”的画法,竹子出生时节、叶已全,因此重要的不是竹子的外形,而是先于知识的、竹子于人生生命中的意义关系,“执笔熟视”不是仔细端详竹子的外貌,而是体味竹子于生命中的交互情意,涌现欲画之情,进而“振笔遂逐,以追其所见”。要知道知识在被思考、处置前,总先行地与人共生存,基于共同体共生的生存,人才能思考、处置本已在其中的竹子,至于知识的对象、有用的器物,不过是思考、处置的结果罢了。他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体验、生活、体味事物与己身的关系更重要,而理性、知识、结果都是末端的事。

好好地生活比什么都好

如果说学生时代的李志春是“生活至上”,当他走出校门、进入就业市场,并成为众多“打工者”中的一员,他又是如何选择的?2016年,即将博士毕业的他和其他同学一样,给江浙一带的高校投了一圈简历。结果发现,在那些名校眼中,一个复旦毕业生不过是平平无奇的求职者。名校“爱搭不理”,次一级甚至一些二本学校尽管抛出了“橄榄枝”,却要求他接受“非升即走”的考核。李志春厌恶这种“养蛊式”的教育生态。

一场大学党委书记和人工智能的对话——

办学治校,人工智能可以取代人类吗

■本报记者 陈彬

前段时间,无人驾驶出租车“萝卜快跑”在国内一些城市投入使用,曾引发了公众的普遍关注。一次出差中,浙江外国语学院党委书记、浙江工业大学现代大学制度研究中心主任宣勇便在出租车上听到了司机对于这件事的“吐槽”。其间,司机说道:“既然人工智能这么厉害,那能不能实现无人领导呢?”这句话引起了宣勇的注意。经过上网查阅,他发现随着人工智能的不断发展,类似声音已经不再新鲜。身为高校领导者的宣勇自然想到,在高校的治理问题上,人工智能是否可以完全取代人的作用?此前在针对高等教育问题的研究中,宣勇曾多次开展过系列访谈。此次面对与人工智能有关的话题,他决定创新一下访谈形式,将问题抛给目前比较成熟的6款人工智能大语言模型,由此展开了一场他与人工智能之间围绕高校治理的对话。不久前,在清华大学主办的第三届清华高等教育论坛上,宣勇将这场“访谈”的结果以及思考告诉了大家。

让人“安心”的回答

“访谈”中,宣勇首先关注的便是在高校管理中,是否可以实现完全的“无人领导”。对此问题,所有的人工智能都给出了否定的回答。宣勇选择了一个最符合他人偏好,同时也最能说服他的人工智能,其回答也最具代表性。它的回答如下——

“大学组织能否实行无人领导,这涉及组织管理的核心原则和现实操作的复杂性。从理论角度看,无人领导的概念强调自我组织、自我管理和自我驱动,这在某些特定的、小型的、高度自治的团队或项目中或许可以一试。然而,在大型、复杂的大学组织中,全面实施无人领导极具挑战性,甚至可能不切实际。”这样的回答让宣勇颇感“安心”。不过人工智能也告诉他,大学组织虽然很难全面实行无人领导,但并不意味着不能借鉴无人领导的理念和方法。在实际操作中,可以在某些特定领域或项目中,尝试采用无人领导的模式。在保持组织稳定性和连续性的前提下,适度探索和应用无人领导的理念、方法,以提升组织效率和创新能力。第二个问题随即出现——既然如此,在大学内部治理中,哪些工作是人工智能可以取代的,哪些又是取代不了的?这涉及大学内部治理结构和治理能力的问题。对此,宣勇曾专门进行过研究。在他看来,一个好的大学治理体系要从5个维度进行观察,即要有清晰的教育部署、顺畅的组织运作、高效的资源配置效率、高涨的人员士气,以及显著的学术增长;至于治理能力,则可以分解为党建统领力、战略谋划力、组织变革力、资源整合力、氛围营造力和数字智治力等6个方面具体问题。当宣勇将他的上述划分分享给人工智能时,后者的回应令宣勇惊喜——在治理结构方面,人工智能建议他加入另一个维度——社会影响力的提升。“这个补充非常有

道理,也提示我们,在完善相关研究的过程中,人工智能可以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宣勇说。至于人工智能在大学治理能力的6个方面有何样的优缺点,人工智能也给出了让宣勇信服的阐述。比如针对战略谋划力,人工智能称其虽然可以基于数据进行分析和预测,但战略谋划需要深入洞察行业趋势、竞争对手动态以及自身资源能力等多方面因素,这些都需要人类的智慧和洞察力。同时,在面临复杂、多变的情境时,人工智能可能难以作出全面、准确的决策,战略谋划往往需要综合考虑多种不确定性和风险因素,这需要决策者具备丰富的经验和判断力。总之,人工智能确实能通过大数据分析、预测建模、优化算法、情景模拟等方式,在高等教育治理中提升我们的效能。但同时,其由于在数据依赖、非结构化问题处理方面的局限,特别是在人文情感能力方面的不足,难以实现对人的全面替代。”宣勇说。

“领导者”还是“管理者”?

不久前,聊天机器人 ChatGPT 的母公司 OpenAI 提出了通用人工智能的分级标准,用以确认人工智能的进展。其具体包括聊天机器人(具有会话能力的人工智能)、推理者(解决人类水平问题的人工智能)、代理(能代表用户采取行动的人工智能)、创新者(能够协助发明的人工智能)组

他请教了多位人工智能专家,了解到人工智能大模型的发展主要依靠三大要素——数据、算力和算法。这其中,最能体现人工智能价值的是算法,因为它决定了数据的解读方式,以及数据的意义是什么。“然而,算法是由技术人员设计出来的,所以数据的意义在本质上仍取决于算法设计者本身的理解,甚至反映出设计者的价值观。”宣勇说。当前,我国的高等教育治理正面临数字化转型。这意味着未来人工智能必然会更加深入地融入高等教育治理中,同时也意味着人工智能背后的资本和技术力量,以及这些力量所代表的认知及价值观也将介入其中。“这是一个需要我们正视的问题。”宣勇说,如果处理不好,很容易形成“懂技术的人不懂治理,懂治理的人不懂技术”的局面,为高等教育治理的数字化转型带来困扰。对此,他建议在高等教育治理中,促进计算机科学、教育学、心理学等多学科领域的专家学者进行合作研究,共同探索算法在高等教育治理中的应用和优化策略。他还建议高校加强与算法基础相关专业的建设和发展,培养具有扎实算法基础和创新能力的人才。同时,鼓励教师参与算法研究和应用实践,提升教师的算法素养和教学能力。“总之,作为大学的领导者,要主动将人工智能嵌入大学内部治理体系中,形成人机协同、共同治理的新形态。我们不能把所有的工作完全交给人工智能,但也不能对此趋势坐视不管,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人机协同。”宣勇说。他表示,在此前的高等教育内部治理过程中,我们已经在教学方式改革、教学评价改进、教育资源共享、教育智能服务定位等方面实现了人工智能的应用,但高等教育内部治理所囊括的内容远不止这些。“如何进一步积极拓展人工智能的应用场景,推动数字化校园建设在内部治理中的更广泛应用,将是接下来努力的重要方向。”

需要正视的问题

宣勇与人工智能的这场对话持续多日。其间,